



镜头——我的一支笔

聚焦生存 JUJIAOSHENG CUN

赵铁林“另类人生”拍摄手记

赵铁林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中国摄影文化系列画册



聚焦生存

—— 赵铁林“另类人生” 摄影手记

赵铁林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卫卫工作室
策划出版：卫卫工作室
责任编辑：葛卫卫
文字编辑：王文元
装帧设计：王晨
电脑制作：陈颖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出版：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焦生存 / 赵铁林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2.3

(中国摄影文化系列画册，4. 影人自述)

ISBN 7-80536-905-4

I. 聚... II. 赵... III. ①摄影艺术—艺术评论
—中国②赵铁林—自传 IV.J4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633 号

影人自述 04

聚 焦 生 存

—— 赵铁林“另类人生”拍摄手记

赵铁林 著

出版：浙江摄影出版社

发行：浙江摄影出版社发行部

(杭州市葛岭路 1 号 邮编：31000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142mm × 201mm

印张：7

字数：15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536-905-4/J·511

定价：3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作者简介

赵铁林，1948年11月5日生于辽宁省北镇县。1968年上山下乡到河南。1970年回京工作。197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83年留校任教。1986年进入北京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89年“下海”开公司。1994年成为自由摄影人。1999年3月出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2000年10月出版《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

目 录

拍摄手记

拍摄手记 · 1	2
拍摄手记 · 2	6
拍摄手记 · 3	10
拍摄手记 · 4	17
拍摄手记 · 5	19
拍摄手记 · 6	25
拍摄手记 · 7	28
拍摄手记 · 8	38
拍摄手记 · 9	41
拍摄手记 · 10	45
拍摄手记 · 11	54

摄影作品

机场东路	62
十庙、英太村	74
小丽的故事	95
阿 V 姑娘的日子	109
阿香的遭遇	122
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	138
都市苦力	154
麻余渡口的传说	168

作品评论

用光线照亮黑暗	190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 萧绪珊	

岁月留痕	192
《大众摄影》杂志编辑部主任 闻丹青	
纪实的意义	19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平	
别一种另类	19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教授 陈福民	
赵铁林的摄影	197
三联出版社图片编辑 李玉祥	
关于《另类人生》	198
止庵	
我看赵铁林的书	201
社科文献出版社副编审 罗琳	
纪实的物质与陌生的艺术	205
三联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 舒炜	

尾 声

感觉 —— 摄影	208
镜头 —— 我的一支笔	212
阿香的遭遇，阿香照片的遭遇， 摄影师的遭遇	214
编后	219

拍摄手记

PAISHESHOUJI



拍摄手记 · 1

1994年的冬天特别冷，起码我是这样感觉的。过了腊月二十三，我来到赵公口长途汽车站，拎着两件行李，准备去Z市，对我在那里即将倒闭的公司作最后的努力。我的思路是：既然计算机的生意不好做，索性在公司里腾出一部分场地开个影楼。“人事工作”已经做好，Z市经七路一家大型影楼的首席摄影师老聰同意做我的副经理；而我原来从北京带来的副经理小孟给他当助手，主要是跟他学习暗房技术。

长途汽车出了北京，天色已近黄昏。公路两旁的树，连一片树叶也没有，尽在北风中晃来晃去，真闹不清它们到底想做怎样的姿势。细小的雪花开始在风中飞舞，有不少居然从车窗、门缝中吹进来，使我愈发地冷。我的铺位紧靠着司机的座位，离发动机不远，可还是不行。我用呢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希望尽快入睡，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忘却寒冷，还可以忘却烦恼。以前我就有过无数次这种体验。睡眠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梦中死去，还可以在现实中活过来，这种死而复生的幸福感觉，我差不多体验过一百多次了……

“起来，起来！保定到了！下面有饭馆和厕所，都下去，车上不许留人，谁留下谁就是小偷……”大家自然都不愿意当小偷，争先恐后地下了车。我将仅有的两件行李做了标记，也跟着下去了。小餐馆里一盏40瓦的白炽灯，照着各式各样的吃相。几位境遇不太好的旅客不点菜，只是要一碗热汤，就着自己的干粮，坐在餐馆的角落里。我吃完了饭又感到口渴，喝完了一瓶啤酒后，又感到肚子胀，急于想找厕所，问一位河北大嫂厕所在哪，这位河北大嫂（服务员）将嘴一呶说：“后面。”我急忙穿过后门，后门外一片空旷，哪里有什么厕所。我解完小手又感到肚子痛，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再解大手……突然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我感到事情不妙，提着裤子赶了出去，但为时已晚。我望着已经开走的汽车捶胸顿足，大声叫喊，可是无济于事，汽车连同被它拖着跑的雪花逐渐远离了我。我感到手脚发凉，因为我的行李包里还

有一部心爱的玛米亚照相机，这可如何是好？我开始怀疑这是辆黑车，哪有把客人甩下，拉着客人行李跑的！随即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除了我被拉下外，其他的旅客都随车走了。我只好认倒霉，开始站在那里拦过往的车辆，希望能追上已经跑掉的汽车。然而来来往往的汽车并不因我招手而减慢速度，仍然风驰电掣般地从我身边驶去，将旋起的雪花打在我的脸上。失魂落魄的我又返回店里，问河北大嫂有没有电话，“你干啥？”“报警。”河北大嫂一脸惊诧地说：“大兄弟，你报啥警，车一会儿会回来的，这些司机我们都认识，他不会丢下你，再说，我们这里也没电话。”我看这位河北大嫂说话很诚恳，就将信将疑地往外走，心想真是遭了瘟，“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没想到，过了不久，车子果然回来了，驾驶员耷拉着个脸，说我不该耽误旅客的时间，我什么也不说，上车继续倒头睡。天亮的时候，汽车已行驶在黄河花园口的公路桥上了，我捏了捏行李袋，“玛米亚”硬硬的还在。晨曦中芒山的余脉被从黄河上冉冉升起的朝阳染成了一片绯红色。

1991年的初夏，这里可不是这种颜色，满眼的青翠将裸露的黄土地遮挡得严严实实。我拿着一部苏联的“泽尼特”，经常来到这里给一个叫绍雯的女孩拍照。那年绍雯19岁，照片拍得她满意我也满意，有几张至今还压在她的玻璃板底下。我们俩徜徉在柳转莺啼的小树林里，拍东拍西，拍了不少所谓的纪念照。要说摄影起步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往后的事更是层出不穷，而摄影和我的生活也结合得越来越紧。

我在Z市公司的名字叫高科技产业发展公司，位于金水路和经二路的交叉路口。公司对面是中原宾馆和国际饭店。公司新注册，业务发展得不错。绍雯做了我的会计。闲暇时，我特别喜欢拿着我的“奥林巴斯”到处给别人拍照。有一部好相机想显示一下，是摄影爱好者的通病。公司的职员被我拍了个遍，附近的街景也拍了无数。那时我差不多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摄影家了。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却出了一档子事，我差一点被我老爹赶回北京（父亲时任该省检察院检察长）。

业务发展少不了应酬，歌舞厅和酒吧我没少去，而且认识了不少年轻的女孩，一来二往彼此间也就熟悉起来。一天，在国际饭店西餐厅，我和我的副经理小孟遇见了小霞和小洁，这是两个经常出入歌舞厅的女孩。可我们的屁股还没在沙发上坐稳，就被突然来到的几个便衣带出了餐厅。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便衣们回答说到地方就知道了。我们分乘两辆出租车，被带到火车站附近一幢黑洞洞的楼里。进了办公室，才发现先我们而来的还有七八个女

孩，她们正在排队等候罚款。因为我们没做什么事，心里很不服气。罚款是每人200元。我看到当头儿的那个人黑着个脸，知道跟他理论也没用，就问身边的小洁怎么回事。“哎呀，这你都不懂，这叫‘干拍’，你赶快找人疏通，千万不要跟他顶撞，否则就不是200元的问题了。”小洁边说边用眼睛暗示我打电话。我走过去问那位头儿：“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谁打？”他抬起眼睛，上下打量我一番，“你叫什么？电话号码是多少？”我将检察院总机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他挂通了电话，电话里传出了检察院值班室一位女士的声音：“请问你转哪？”我看到这位粗壮的汉子有些犹豫，便将电话接了过来，说出了副检察长的名字。我不敢将电话接到我父亲那里，怕老头子气出个好歹。电话正在转接的时候，这位汉子一下子就将电话挂断，又上下打量我半天，问我父亲的名字。最后他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说了一句：“你们走吧！”我和小孟走出了房间，小洁和小霞也想趁机溜走，那位汉子阻拦道：“你们俩不许走！”我问：“为什么，我们怎么了？”他不再理我，只是冲着小洁说：“下次不要再被我抓到，否则就没这么便宜了。”我们四个人稀里糊涂地下了楼，出了大门。我这才想起不对劲，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凭什么可以随便抓人？小洁说：“你别糊涂了，这里叫608。虽说不是公安局，可比公安局权利大得多。”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该市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一个派出机构，专门负责社会上的“扫黄”事宜。我被608“扫”了一次的消息很快传到我父亲的耳朵里，父亲将我和小孟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讲，我看你们的公司还是不要在这里办了，回北京吧，我可丢不起这个人，政治影响多么恶劣。我极力解释，说608“干拍”是不对的，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老头子在气头上，说什么也没有用。

第二天，我买了张车票就回北京了。到了北京接到绍雯的信，说她十分伤心，想不到我是这么个人……“我是这么个人”——这么个人到底是怎么个人？

这场风波过了好久才停下来，这倒使我下定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

从北京再次回到Z市以后，我便在工作之余，大肆给那些风尘女孩拍照片。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有一次在大排档，我和我的副经理，还有一个叫唐菀的女孩在吃饭，又碰见了608那伙人，我说：“怎么着，又跑到这来‘干拍’了？”“哪里哪里，上次是误会。”说着领头的一个便端起酒和我碰了一下，表示尽弃前嫌。

我在我第一本书——《聚焦生存——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女孩》中曾说过一段话，暗示了这段“公案”发生前后的事情：

现在书中的照片绝大部分是1994年之后拍摄的。虽然从1991年我就关注这个题材，但由于当时的工作重心不在拍摄上，而且最终如何使用这些片子根本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因此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摄影”。尽管如此，这些早期遗留下来的照片，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开影楼不能没有放大机。我从公司有限的资金中挤出2万块钱交给老聪，让他从北京进了一台彩色放大机。放大机是德国恺撒牌，黑白、彩色两用，加上3个镜头，一共是14500元。可不知道什么原因，货到后，老聪只承认放大机是他替我买的，那3个头是老板看着他的面子送给他的，和放大机没关系。他表示镜头虽然是他的，但我可以无偿使用，为此我心里还十分感动，也没有深想一步：北京“国华”，一个大型国营商店，居然看着他的面子卖放大机，还送3个镜头……虽然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鬼画符，可那时我已经流落K市街头，靠拍10块钱一张的片子糊口，哪还有力气和他纷争这些是非非。

长途汽车终于驶进了Z市汽车总站，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司，将心爱的“玛米亚”拿了出来，交到老聪手上，希望他努力工作，救公司于危难之中。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对付各路债主，可债主并不好对付。原本不错的朋友这会儿都撕破了脸，大有不还钱就要大打出手的势头。没办法，我将我的心腹（从北京带来的小孟）叫到身边，让他协助老聪支撑危局，并告诉绍雯，如果公司有什么变故，立即和我联系。

春节前我又返回了北京。

大年初一，原本说好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由绍雯寄给我。可打电话过去，绍雯讲，我的工资她已交给小孟，托他带回北京，当面交给我。我打电话给小孟，孟说他手头很紧，只字不提工资的事。我明白了现在上演的是“食尽鸟投林”的戏，我再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了。我爱人及岳母看出我心绪不佳，便提议下午到颐和园去散散心，还特意嘱咐我带上照相机，给她们娘俩拍几张照片。

大年初一的颐和园总是冷冷清清的，“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再加上彤云密布，时不时地还飘落些小雪花，使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在后湖，我用我的FM2没精打彩地给她们娘俩拍了几张照片后，便把注意力转到了北宫墙土坡上的几株古老的槐树。冬季里摆脱了一身累赘的古槐将铁铸似的树干

直指天空，北风袭来，枝干瑟瑟抖动，但依然是挺拔而古怪。我用24毫米的镜头一口气拍了七八张，这些照片后来一直挂在我在H省的陋室之中。我暗自下定了决心：既然我不是干生意的材料，那就换一个职业吧。

过了初五，我开始做南下的准备。人们都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几年的经商生活，使我逐步明白了钱的意义，即所谓“一分钱能把好汉憋死”。钱的意义既然这么重大，那么南下的当务之急，就是筹钱。我清点了一下家底，可卖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一部崭新的尼康FM2黑机身和一支20毫米的镜头早已卖掉，现在可卖的只有“奥林巴斯”、美能达4型的测光表和一部潘太克斯SUPER A。这些东西我估计能卖万把块钱，于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在原包装盒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C.W文化馆的二楼，找到了开二手器材店的老李。老李是这个行当的老手，他像号脉似地把这些东西掂量来掂量去，最后略带歉意地说，东西还行，可惜他手头紧，建议我到隔壁去试试。隔壁是佳能公司最早开的维修站。没办法，我又将我这些宝贝给隔壁提了过去。这回倒挺利索，三下五除二，7000块钱成交。我两手空空荡荡地走出文化馆，想当初秦琼卖马也不过是我这个德性。我顶着北风往回走，心想，有朝一日，老子一定买一部“莱卡”。可时至今日我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拍摄手记·2

春节过后的K市街头冷冷清清。我对这种景象早已习以为常，不进3月份“大陆仔”是不会回来的。虽然闻海的人经过几年的折腾早已分出个子丑寅卯来了，富的可比石崇，但大多数仍是出卖苦力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确实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但回家过年却是相通的。

连绵不断的小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我暂时蛰居在南湖酒店的一间客房里。吃了一周的方便面以后，我终于开始在街上走动了。首先是找房子。衣食住行乃人生的第一要义嘛。

在北京时，我已经知道了几个摄影界大腕的名字，而且也大概地知道他们的作品，仔细欣赏之余，我不但明白了他们的长处，也看出了他们的破绽。在我脑子里出现得更多的是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及莱蒙托夫的作品，同时我也知道影像的修炼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对于题材和内容的

把握是我眼下急需抓紧解决的。“小姐”这个题材仍然吸引着我，我决定继续拍下去。

不过，既想拍“小姐”，住得就不可离她们太远，首选是笼舌坡。可笼舌坡太乱，熟识的姑娘也太多。机场东路发廊中的女孩子大多数都在这里赁房，后来在我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小丽、阿云、阿莲、刘建英、小燕、素琴……都毫无例外地住在这里。这些姑娘大都是我在1992年、1993年认识的，倘若片子拍到一定程度，她们经常找上门来，就不可避免地要打乱正常的生活节奏。“思考”是我生活中绝顶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正在思索，望着天花板出神时，忽被不期而至的姑娘们打断，那真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情。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间离是很重要的。既然笼舌坡不行，英太村就成了首选，我对那一带也比较熟悉。于是，2月21日我搬进了英太村229号，月租800元。房东非让我一次性交完3个月的租金，这样我所带的钱已经三去其一了。我添置了简单的家具：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皮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简易衣柜，一个煤油炉，一把菜刀，两只锅子，若干碗筷，这又去掉了1000多元。我开始发愁，手里剩下的这点钱，怕拍不了几张照片就得打道回府。看来，找一份工干是保证在H省待下去的惟一途径。

1993年，我曾给金洋印业拍了大量广告，和他们混得比较熟，不妨再去找找看。可到他们公司后，才知道过去那个金洋印业早已不复存在，老板正在搞传销，忙得不亦乐乎。公司已抵给一个从深圳来的广告商，此人姓陈，叫陈扶立，他已经将公司的名字改为仁人广告公司。他听说我的照片拍得好，又懂计算机，立刻来了兴致，非得让我入伙，说公司发达以后，让我当副经理，月薪3000。不过他说，眼下公司正困难，正在和台商谈LED显示屏的业务。和台商谈判少不了懂计算机的行家里手，他说如果我能帮他把这笔业务拿到手，他可以给我20%的干股。老实巴交的王少南是金洋印业剩在这里的临时主管，看着陈扶立唾沫星子乱喷，话说得没有边际，就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让我提出一些眼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赵行进在机场东路。(王军摄影)

我问陈扶立，吃饭怎么办？住怎么办？通讯怎么办？他说：“好办，公司中午管一顿饭，住宿费公司报销400元，过几天等钱一到账，给你买一个BP机。从现在起你就是本公司工程部主任。”他又指着坐在电脑旁的一个年轻后生说：“小唐就是你的助手。”小伙子朝我腼腆地笑了笑，并自我介绍了一番。他是土家族人，中专毕业，学平面设计的。

为了表示诚意，陈扶立请我到楼下用晚餐，可到了楼下，他又说这里的大排档味道不好，让他的司机把我们拉到英太村。坐在车上，他那张嘴巴絮絮叨叨地讲个没完，一会儿说和我相见恨晚，一会儿又描述他的宏伟计划。他说他已经和台湾兴华电子公司签了合同，以650万元的价格购进一个大型的户外广告屏，像这样的广告屏在全国仅有4块……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想，这种LED发光二极管的彩色大屏幕，早在7年前就被我所在的研究所搞出来了。我奇怪的是，这位其貌不扬，穿着也不甚讲究的陈扶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经济力量，他这部“皇冠”2.8的来路可能就有问题。车到了机场东路物资楼下面一间茶坊时，他招呼我和他一起下了车，并让司机把车开走。我们俩人进了茶坊，服务小姐问我们用点什么，他用粤语说了一遍，小姐没听清，他便显得十分不耐烦，对我说：“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说鸟语的地方，大陆话他们听不懂。”看到那位H省女孩受委屈的样子，我就随便点了两份套餐和两瓶啤酒。饭时，陈扶立的嘴巴也不作片刻停息，一会儿说他是双子座，一会儿说他是ABH血型。我纠正他说，血型有AB，但没有ABH。他嘲讽似地冲我笑了笑，“不错，血型是AB，但我血中有一种H因子，这种因子大多数AB血型的人不具有，所以我就比别人聪明，而且晚上不睡觉。”我无言以对，看着这位半科盲，心想他爱说什么说什么，我的目的是找份工干，好把我的正经事坚持下去。

“咦，老赵，你怎么跑这来了？”我回头顺着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原来是素琴和胖妹。俩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大半个胸脯露了出来，尤其是胖妹，丰硕的胸部好像要直抵过去。陈扶立也来了精神，抿着嘴在一边笑。“我们的照片呢？”陈扶立疑惑地看了看我，问：“什么照片？”我告诉胖妹她们，照片没有带在身边，过两天再给她们送过去。接着又将我在机场东路拍照片谋生的事情说了一遍。看得出，他并不太相信我的解释，他说：“不对吧，是不是想到发廊来看姑娘……”我怕他说出更加不堪入耳的话来，便拉着他，结了账，出了茶坊。

马路上熙熙攘攘，来往的车辆很多，各式各样的摊档都掌起了灯，鳞次

栉比的发廊门口三个一堆、两个一伙地围坐了不少姑娘，她们嘻嘻哈哈地和来往的客人打着招呼。陈扶立可能是由于我和素琴、胖妹的意外邂逅，陡然长了不少勇气，拉着我进了一家名叫绿叶的发廊，一进门便碰到了阿静。她的鼻子上贴了白纱布，白纱布上还打了一个十字封条，见到我们进来赶忙让座，同时给我解释说，她新近做了隆鼻手术，照相的事要过几天再说。我看她误解了我们进来的意图，就赶紧指着身边的陈扶立告诉她，我们是来消费的。阿静这才注意到陈扶立那张不尴不尬的脸，她冲着门口喊了一声：“有客人，都进来！”话音未落，就涌进来三四个姑娘，陈扶立从容不迫地点了一个女孩，随后便上了楼。阿静问我：“你呢？”“我什么我，我没钱，咱们还是聊聊天吧。”其余的姑娘一看没得生意做，又都退了出去。一个年龄很小的女孩不甘心，便对着阿静说：“阿静姐，这还有一个呢？”阿静说：“他是照相的，从来不消费。”姑娘们都退走了，阿静便和我摆起了龙门阵。先说我的

照片好，接着又说隆鼻手术花了2000多，最后便褒贬各地来K市讨生活的女孩子，“要说漂亮还是我们四川姑娘最漂亮，四川又数我们重庆的女孩最出色，只可惜我们的鼻子都像一个纽扣似地趴着。我们四川女孩最讲义气，从不嫌穷爱富，你看我那个老公，失业在家好几个月了，我每个月还要劈一半钱给他寄去……”似乎是为了证明刚才的话，她提议给我洗头而且价格减半，5块钱！同时让我以后给她照相也要价格减半。头洗得差不多的时候听到了楼梯响，刚才那位姑娘下了楼，一头钻进了卫生间，随后从镜子里看到陈扶立摇摇晃晃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夜晚的英太村，灯火通明，我好几次试图将这夜景拍下来，但效果都不太理想，有灯光的地方太亮，没灯光的地方又太暗。这使我想起了A. 亚当斯的分区曝光法，可惜当时看得太匆忙，记得不太牢靠，结果冲出来的底片，仅仅在白板上有几个黑点。场面的记述很重要，若干年后，这里“风光”不再，仅凭文字很难将这个勃发的新兴城市再度带回到人们的记忆中。

有了班上，我的工作时间就必须进行调整，每天下班以后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4月14日，陈扶立给我买了一个BP机。可有了BP机又使我不得不浪费很多时间，和他到各式各样的茶坊进行周旋。他不分钟点地乱CALL我，使我发现他对自己办这个公司并没有底。台湾兴华电子公司早已将大屏幕安



赵和发廊的女孩子们聊天。(王军摄影)

装到位，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将首批货款要回。大屏幕的价格根据我提供的技术信息已经从650万降到了250万。随后的几轮谈判，台湾方面又将价格降到150万，并表示这是最后的一次让步。可是就连这笔钱，陈扶立也拿不出来。其实陈扶立根本就没有钱，他到H省来是想空手套白狼。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连一分钱都没拿到，而手头的钱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想办法摆脱窘境。我找到了以前的好朋友阿召，他在检察院工作，有公职，是个H省的小伙子。在几次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我终于帮阿召确定了他在公司中董事长的位置。随后公司进行改组、更名、变换法人，陈扶立被挤出了圈外，而我落得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副总经理。由于我对阿召的特殊贡献，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阿召对我特别的好。除了下馆子吃饭，还时不时地给我一些零花钱，我每个月都能足额拿到3000元的工资，而干的唯一一项工作就是给公司的大屏幕拍照片，并将洗好的照片分发给业务员，让他们去兜揽广告生意。我那个180的头在这时派上了用场，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照片。那位有着“H因子”的陈扶立，后来又在马路上碰上了几次，他承认他败在我的手下，我说：“不对，你是败在了钱下，没钱还想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这十分危险。”谁知此话说完不久，他真的在H省发达了起来，一下子骗了客户56万，逃回了深圳。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听说这笔钱又被他的女朋友给敲诈去了。

拍摄手记 · 3

我在英太村的房子是顶楼，左右邻居都来自湖南益阳。朝夕相处，使得她们对我的镜头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拍来拍去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种浮在表面的一般生活照意义不大，必须要将一些有“故事”的女孩子拉成长趟，作纵深报道，才能发现冲突、发现问题，只有这样，在H省长期居住下去才有意义。

我每天都要去机场东路和那些发廊的女孩子周旋，初步确定纵深拍摄的人选是素琴、小丽、阿云和阿华。小丽在舒心发廊，其余的分别在“午夜牛郎”和燕妮发廊。素琴是我首先注意到的对象，我以前曾给她姐姐家捎过海鲜，大致知道她在重庆的生活状况及成长背景。尤其是在我知道她有吸毒的坏毛病之后，更觉得有对她进行纵深拍摄的必要。但是，事实上她年龄较大，



赵在1994年给姑娘拍照时经济状况相当糟糕。

(王军摄影)

背后和她的姐妹们讲“老赵是个傻×”时，我就逐渐打消了把她作为长期拍摄对象的念头，现在仅存的几张底片我也懒得把它做出来。

刘建英是个城府不深的女孩，那年她24岁，四川自贡人。家庭情况不清楚，她老是讲，她有一个男友对她很好，是干“那路”买卖的，钱总是不够花，所以必须靠她在发廊里赚些钱来贴补他。但是拍她，也有难度，她居无定所，来来去去，很没有规律。白天我要上班，碰到她的时间很少，现在她保存在我这里的照片均是以肖像为主。有几次拍摄场景我记忆得比较清楚。一次是在燕妮发廊的门口，那时我刚认识阿云姑娘不久，她落落大方的待人态度引起了我的兴趣，而且她从不拒绝我在发廊里给她拍照。阿华是阿云的好友，虽然年龄比阿云小得多，只有19岁，稚气未脱，但也染上了吸毒的毛病。店里生意红火，阿华想买毒品，但脱不开身，便不知从哪里将刘建英找了来，她告诉建英，她想匀一点，刘建英跟她要了50块钱，然后，掏出一个小纸包，倒了一点砖红色的粉末给阿华，阿华便独自一个人跑到楼上去。我问刘建英拍不拍照片，她欣然同意，便站在发廊门口的一棵树边点燃了一支烟，让我拍了一张。这张照片至今还保留着，是我给她拍得最早的一张。

第二次是刘建英从青岛回来。在小丽的宿舍，她一边抱怨青岛那边的“娘儿们”人高马大，光欺负她们这些四川妹子，稍不对就拳脚相加，在“生意”上竞争不过她们，只好回来了。小丽将我给她拍的照片选出了几张挂在四周的墙上，刘建英看了很是羡慕，希望我也给她拍这么一套。建英的经济很窘迫，从来就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她向小丽借那件白色的和服，并当着

每一次接触，她都使你迅速地陷入一种被她布置好的难堪的境地，这使你连拿出相机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一次，在上村——她的新住所，我去拜访她时，正赶上她毒瘾发作，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央求我给她一些钱，让她去买毒品。使得我很难造成一种间离的效果，照片自然是拍不成了。当她准备戒毒，通过我和王少南的关系住进了省中医院（王少南的父亲时任该院的副院长）的时候，她又向我索要一笔钱。我感到不堪重负，尤其是当我听到她在